

美国公众民俗学的理论 贡献与相关反思

□ 杨利慧

[摘要] 公众民俗学是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美国民俗学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主要指的是对民俗加以展现或应用的实践活动,以及关于这种实践的理论探讨。从产生之后,它在民俗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与此相适应,关于它的理论总结和学术反思也日益丰富。它们不仅为公众民俗学的实践提供了更加深刻的理论指导,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整个美国民俗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 公众民俗学;理论贡献;反思

[中图分类号] K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4)05-0092-04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American Public Folklore and Related Reflections

YANG Li-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Public folklore, which means both practices like displaying or applying folklore in a new context and academic researches into these practices, emerged and developed in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It has grown int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ctions in American folklore.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oretical summarization and academic reflection as well as in practices. They not only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practice, but also further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American folklore.

Key Words: public folklor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reflection

公众民俗学(Public Folklore)是美国民俗学界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在新的语境中对某种民间传统加以展示或应用的实践活动,这种展示或应用,通常是通过传统承载者与民俗学者或其他文化专家的协作努力来完成的。^{[1](P1)}二是指从学术研究的领域对这种实践所做的批评、分析与理论总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在前者获得长足发展的形势下才逐渐兴起的。

从产生之后,这一分支学科在美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俗学工作者参与到了相关的实践当中。从美国民俗学会的情况来看,学

会所属各个分支部门中,最大的一个分部就是公众民俗学分部,而该学会中大约一半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是公众民俗学者。^[2]这些学者,在组织博物馆展览、对民俗进行立档和编目、保护地方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制作民俗音像产品、组织教师培训、制定难民救助项目以及组织和主持节日活动等许许多多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对著名的史密森美国民间生活节(Smithsonian Festival of American Folklife)进行策划和组织,对南卡罗莱纳州海岸偏远乡村非洲裔美国人编织香草篮的传统予以保护,等等,都是公众民俗学者在广泛领域所获突出成就中的典型例证。^[3]随着这一分支学科的蓬勃发展及影响的日益扩大,美国民俗学界对它的理论探讨

和学术反思也不断增强和深入,出现了大量总结性的论著和反思性的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既为公众民俗学的实践提供了更加深刻的学术指导,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丰富和深化美国民俗学整体理论的作用。

一、公众民俗学的理论贡献

近年来,关于公众民俗学究竟有没有理论贡献的问题,是美国民俗学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话题。有一种意见认为,公众民俗学者只是在运用被学院派的学者所发展的理论进行实践活动,他们对民俗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并没有什么贡献。^[4]这种看法主要来自学院派的民俗学者当中,其中明显体现着一种自我优越感和对作为实践的公众民俗学的轻视。而且,即使是那些反对以“纯学术”与“应用”这种“错误的两分法”来划分学术研究 with 民俗实践的学者,在论文当中也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以学院派研究为中心的立场,认为公众民俗学者是在运用学院派学者的理论来进行实践活动。^[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众民俗学者在其所工作的广泛领域,作为田野调查者、协作者和管理者,正在持续地发展着一种新的民俗学的工作方式,而这一方式要求学者必须从新的角度对民俗事象进行概念和理论的总结,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正在不断催生着各种新的理论观点。^[6]目前,越来越多的公众民俗学论著和学院派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各种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证实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在公众领域工作的民俗学者,对于如何在这一领域更好地开展各种活动,已经做过多方面的探讨和总结,内容涉及具体的技术、经验以及相关的理论,等等。例如,关于博物馆展览的方法、展览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等问题,就有多种多样的理论总结。在 Karp, Kreamer 和 Lavine 三人主编的论文集《博物馆与社区——公众文化的政治》(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一书中,就探讨了这样的问题:博物馆怎样才能同社区联系起来?社区又怎样同博物馆相联系?这个问题进一步扩大,便成了对公众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学者怎样才能陈述和表现与他们所研究的社区相关的文化,这些社区又怎样才能同这些表现形式相联系?他们由此概括出了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来广泛搜集各种相关知识、与社区发生密切联系并使之获得比较恰当的表现的一系列模式。一位名叫埃德蒙·盖泽(Edmund Gaither)的博物馆馆长指出,博物馆管理者必须对当前和将来的需求具有一定的预见,以此来了解其所在的

社区并为其服务。而这种预见要靠对文化的理解来获得,对文化的理解,是从根本上使博物馆与所在社区相结合的纽带。他的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博物馆界,而且也可以用来概括公众研究领域的所有方面。

又如,公众民俗学者在自己的实践中还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当他们准备把自己关于多样性的社区文化的研究结果以博物馆展览或音像媒体的形式向公众展示之时,他们必须要经过选择、阐释和创造性的生产过程。他们首先要从所搜集的材料中选取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资料来制作作品。那么,什么样的资料才具有代表性,哪些材料又较少或不具有代表性?这种选择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阐释的过程,它是受选择者的相关知识和理解能力所引导的。而当选择了要展示的材料之后,如何对材料进行展示,也是一个阐释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受经过学科训练的、创造性的思想所引导的。同时,制作者对社区及其需求的深入、全面的了解,也是使他们生产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一个重要前提。^①

除了公众民俗学者所总结的关于具体实践的各种理论之外,他们的工作对整个民俗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也多有贡献:它使得民俗学者对一系列原来并不曾注意的问题和事象进行了思考和探讨——如学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化认同问题以及非言语的民俗文化现象等等,从而促进了民俗学理论的拓展和深化。有学者指出:“通过在民间生活节庆活动、展览馆和学校开展工作,公众民俗学者不断地唤起并打乱了日常生活的一般范畴:他们把平常处于私人范围的事象转移到了公众领域,他们把一些人认为是非艺术的东西命名为‘艺术’,他们挑战作为文化阐释者与外来者的民俗学家同作为被解释的艺术之承载者的民众之间的界限,他们质疑作为观察者的观众与作为表演者的事件参与者之间的区别,他们把自己从学院派的学者重新界定为公众民俗学者,并且激发学院派的学者不得不思考自己在公众民俗中应扮演的角色。通过把上述这些问题以及大量其他思考带入学术领域,公众民俗学者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它挑战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6]这可以说是对公众民俗学的理论贡献的精彩概括。

大卫·E·维斯农(David E. Whisnant)在他的《那一切都是本土的和精美的:一个美国区域中的文

^① 感谢好友杰茜卡·安德森·特纳(Jessica Anderson Turner)为我慷慨出示了她的未刊稿“Building Connections, Making Choices: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and Public Sector Ethnomusicology”,并提供了以上两个例证。

化政治》(All That Is Native and Fine: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an American Region)一书中所提出的“系统的文化干预”(systemic cultural intervention)观点,被认为是一种较好地使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维斯农指出,当一个人或机构怀着改变文化的意图,有意识、有计划地在一个社会环境当中行动之时,就会有文化干预。干预者往往认为他们所促使的文化变化是有价值的,而他或她的行动,其方式相对来说又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区分。较消极形式的干预可能包括诸如发展和建设档案收集一类的行动,较积极形式的干预则需要进行文化复兴一类的工作。如果一种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民间音乐家在许多聚会场所表演的可能性,或者是为了建立教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的教育体系,那么这种形式的干预就是消极的。对文化干预的消极的目的会导致消极的结果,反之亦然。维斯农认为,所有公众民俗学者的工作都是一种文化干预,他们必然会对其所工作的社区产生影响。他说,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干预,而在于怎样干预以及期待什么样的结果。大量的例证都表明,民俗学者的工作可以具有一种影响社区生活的作用,甚至能够提供一种帮助官方行政部门制定政策的有益视角。但同时,对民俗学者的干预所包含的潜在危害,维斯农也做了一定的概括和警告。^[6]

对于公众民俗领域的各种事象,民俗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涌现出了不少关于人们如何创造公众领域的展览的新观点。

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帕特丽夏·萨温(Patricia Sawin)和因塔·盖尔·卡彭特(Inta Gale Carpenter)合著的《关于民间生活节的反思:关于参与者经验的民族志》一书,也是在公众民俗研究领域经常被引用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一批民俗学者组成研究小组对1987年的史密森民间生活节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成果。对于这一节日活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假设是,认为它能够充当民间文化的保存与推动的工具,民俗学者则对此提出了疑问,并且从多种角度对这一活动的实际效果进行了探讨。不过,以往的许多相关研究,大都是从节庆活动组织者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却很少关注具体活动的参与者。印大的民间生活节研究小组的工作,恰好填补了这个方面的空白,他们主要从参与节庆的艺术家的角度对这一活动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通过细致的参与调查和访谈,他们发现,参与活动的艺术家并非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只是在按照活动组织者的安排行动而没有任何的创造性。他们实际上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影响和制约着节日活动的进行,他们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活动

的组织者。而在表演的过程中,他们有着自己的关于表演内容、表演方式的观点,以及根据具体情境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表演方式和表演程序的自由,这同活动组织者的想法也并不完全一致。正是他们的积极、能动的参与同组织者的策划和管理的共同作用,才创造出了史密森民间生活节这一庞大、复杂的巨型活动。^{[7](P4)}

芭芭拉·科申布莱特—吉布丽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在她的《目的地文化》一书中,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关于博物馆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展览场所的理论观点。该书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展览意味着什么?”作者集中探讨了各式各样的展览中介(the agency of display),如博物馆、节庆活动、世界性的集会、历史的再造物、纪念馆及旅游景点等,并揭示了展览对象——以及人——是如何通过被搜集和展览的特殊方式来向我们“表演”其意义,以及特定的展览技巧又是如何传递强大的信息的。全书的核心论文《民族志的对象》,分析了博物馆展览中存在的悖论。它指出,在博物馆的展览中,被展示的对象是脱离语境的、局部的或片断的,这里所呈现的更多的是展览组织者与创办者的意图,而不是那些名义上被阐释的物品或文化本身。本书在第一部分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展览就意味着操纵,所有的展览在本质上都是戏剧性的(fundamentally theatrical)。该书最后一部分关于公众空间中的表演与解释、特别是关于文化节庆与集会的事象的探讨,则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论断和问题。作者指出:“意义”,似乎日益被定位在了目的地而不是过程中,那么,我们究竟能否真正地谈论“它们”,或者说,所有的展览是否真是关于“我们”的?我们如何通过物质证据的研究来突破这种悖论?我们能够突破它吗?这些问题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展览物质的证据并清楚地解释展览对象以及使这些对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中介形式呢?^[8]

玛萨·诺库纳斯(Martha Norkunas)的《纪念碑与记忆:马萨诸塞州洛厄尔(Lowell)地区的历史及其表现》一书,研究的是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地区的公共纪念碑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关于当地重要事象的观念的改变而变化的情形,这是一部关于大众记忆与展览的政治研究的重要论著。洛厄尔是美国工业革命的中心和国家历史公园,也是诺库纳斯的祖辈和家庭居住了150年的地方。1989年,诺库纳斯重新回到了故乡,担任联邦政府资助的洛厄尔历史保存委员会的主任。经过对洛厄尔全地区的考察,她发现这个城市有250多座当地建造的用以纪念民族团体、本地男子和男孩以及其他许多人群的

纪念碑。她由此认识到,通过地方纪念碑和联邦资助的公众艺术来探讨记忆与历史问题,可以发现丰富的潜在意义,于是便开始了本书的研究。在书中,作者探寻了表现在洛厄尔公共空间中的个人与公众的相互影响、个体与集体的记忆与历史。由于自己丰富的家庭史,作者与这一城市之间具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贯穿在本书当中,使得作者的记忆与该城市历史之间的结合点成了全书自始至终关注的焦点。局内人与局外人相对立的观念则是该书的主题,它所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具有在公众场合发言并建构历史的权力?另外,洛厄尔没有为妇女建造的纪念碑,诺库纳斯因此也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性与男性的记忆在公众空间的哪一点上有所交汇?如果存在这样的交汇点,那么妇女又是如何记忆和被纪念的?在这本书中,作者的个人记忆与专业调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她对记忆与历史之动力的探讨表现出了一种独到的视角和特殊的深度。^[9]

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公众民俗学”的内涵,另一方面也为美国民俗学界带来了诸多新鲜的活力。

二、对公众民俗学的反思

除了进行理论的总结与归纳之外,许多同时工作在公众民俗学领域和学院派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对公众民俗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反省,因而涌现出了一大批关于公众民俗学的文化批评的观点,它们既复杂又引人深思,而且大都富有争议性。

维斯农曾警告说,公众民俗学者所进行的文化干预工作,并非没有潜在的危害。他和其他不少学者一样,都以批评的眼光检讨了民俗学者善意组织的活动引发相反结果甚至对艺术家、观众乃至整个民族害大于利的情况。他们通过大量个案研究和理论思考,揭示了公众民俗实践当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负面后果,例如,把活生生的人安排在博物馆里进行展览,把被看作私人文化的一些内容展示在公共领域,使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结构通过展览的事件合法化,以及把艺术家看成非政治的艺术安排在被高度控制的政治的舞台当中,等等。这些问题和后果,是公共民俗学者必须予以警惕和深刻反省的。^[6]

鲍曼认为,公众民俗学所确立的一些工作模式中,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关系方面的问题,其本质上是值得怀疑的。他指出,当公众民俗学者自以为是在为所谓的弱势群体代言、替他们展现其文化之时,实

际上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一种自我优越感和话语的霸权,即认为被表现的群体不具有学者那样的能力,因此无法表现自己。他们的看法又影响到了公众的观念,结果导致了一种关于传统、文化、遗产等问题的错误认识。从这个角度说,公众民俗学者所进行的工作,客观上产生了与他们的初衷截然相反的效果。^[10]

亨利·格拉西(Henry Glassie)也说,自己对史密森学会及国家基金会对于民俗学的兴趣一直怀有一种矛盾心理,因为他觉得它们会使美国的政治权力十分轻易地利用美国的传统。他因而对与纯学术研究相脱离的公众民俗学,也怀有很大的矛盾心态。他认为,那些为了把表演者弄到商业区而进行着急速、敷衍的田野作业的人,实际上是确认美国政治权力的同谋。他指出,民俗学者在把优秀的表演者请到商业区去表演的同时,还应该有能力对那些不宜在庆祝活动中表演的传统进行文献处理的自由。传统民俗当中有许多的方面,并不适合在庆祝活动或博物馆展览中展示,比如危险的内容、肮脏的或丑陋的内容,甚至是那些本身很优美却无法在节庆活动中展现的事象,等等,但它们都应该被予以学术的处理或研究。然而,公众民俗学者却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目的大多只是为了庆典。而假如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进行单纯的庆祝活动,那么事实上我们就变成了巩固某种政治力量的同谋。事实上,史密森学会在国家商业中心举办的民间生活节的存在,无形中起到了强化美国执政党力量的作用——无论是民主与共和两党中的哪一党执政。^[11]

这些批评,可以说是抓住了公众民俗学当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但同时,它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深化了公众民俗学方面的理论,对于促进这一分支学科的良性发展,必然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Baron, Robert, and Nicholas Spitzer, eds. 1992. Public folklore [M].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 [2]美国民俗学会网(<http://www.afsnet.org>) [Z].
- [3]安德明. 美国公众民俗学的兴起、发展与实践[J]. 民间文化论坛, 2004年创刊号.
- [4]Ben-Amos, Dan. 1998. The Name is the Thing[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1 (441):257-280.
- [5]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1988. Mistaken Dichotomies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1:140-155.
- [6]Hansen, Gregory. 1999. Theorizing Public Folklore: Folklore Works as Systemic Cultural Intervention[J]. Folklore Forum 30 (1/2):35-44.

(下转第 110 页)

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1](P70)}“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他强调指出:“中国向发达国家开放,但更重要的是向第三世界国家开放。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技术上也各有特长,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互相帮助,进行合作。这对彼此的经济增长有好处,也有利于克服我们各自国家的困难。”^{[5](P148~149)}从1995年至2003年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平均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这与全球的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海关统计,2001年中国和东盟进出口贸易额是416亿美元,到2002年达到5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8%。2003年将达到556亿美元,进口是337亿美元,与2002年相比增长54.5%,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这比10年前增长了5倍以上。东盟已连续10年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国家是双赢的。

再次,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公正、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还必须有一个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来做安全保护。邓小平强调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1](P282~283)}不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搞干涉别国内政,就无法搞建设,发展经济。“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

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1](P360)}当今世界,又出现了危害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即恐怖主义、贩毒集团、贩卖妇女儿童、偷运非法移民、武器走私、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背景和情况极为复杂,必须在有关国家的密切配合下才有可能解决。中国和东盟各国已认识到这个问题,2002年11月,在柬埔寨召开的第六次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发表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双方决心加强和深化在这方面的协调与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保障各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社会的进步文明。■

[参 考 文 献]

-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邓小平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收稿日期 2004—06—10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黄少梅]

[作者简介] 黄成授(1941~),男,壮族,广西大新人,广西民族学院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上接第95页)

- [7] Bauman, Richard, Patricia Sawin, and Inta Gale Carpenter. 1992. Reflections on the Folklife Festival: An Ethnography of Participant Experience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Folklore Institute,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2.
 [8]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1998.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 Norkunas, Martha. 2002. Monuments and Memory: History and Representation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M].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0] Hansen, Gregory. 2000.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Bauman [J]. Folklore Forum 31(2):73-86.

- [11] Hansen, Gregory. 2000. An Interview with Henry Glassie [J]. Folklore Forum 31(2):91-113.

收稿日期 2004—04—10

[责任编辑 周耀明]

[责任校对 黄少梅]

[作者简介] 杨利慧(1968~),女,四川旺苍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民俗学博士。北京,邮编:100875;电子信箱:andm@cass.org.cn。